

走向多元会通而辩证整合的外国文学史研究的光光大道

王忠祥

内容摘要：世界文学发展史已翔实表明文学即审美的人学，其本质（性能与性理）是人类对生活历程和时代变迁的审美反映，同时也是认知自我发展的艺术化观照。无论外国文学史抑或中国文学史的编撰，均不能离弃人学灵魂与审美原理。在世界迅速走向中国，中国迅速走向世界的当下，在“十二五”开局之初文化教育发展趋势喜人之际，积极编撰中国特色外国文学史，是适时的，这一历史的审美的人学工程无疑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所谓外国文学史，就是以外国文学创作及其批评为两翼的“双桅船”连续与时俱进的历史。基于此，外国文学史的编写者和讲授者务必贯彻“四性结合”、“五环互动”的原则。中国特色外国文学史将通过世界文学的比较性和比较文学的世界性的讲述，充分表达“中国心、文学情和世界爱”。

关键词：外国文学史 中国特色 比较文学 世界性

作者简介：王忠祥，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外国文学研究》杂志名誉主编，主要研究英国文学和北欧文学。

Title:

Abstract:

Key words:

Author: Wang Zhongxiang is professor at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Wuhan 430079 , China) and honorary editor-in-chief of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 specialized in English Literature and Northern European Literature studies .

—

所谓外国文学史，就是以外国文学创作及其批评为两翼的“双桅船”连续与时俱进的历史。我国外国文学教学改革和教材建设在 21 世纪显得特殊重要，这不仅是高校文科教育、教学中不可忽视的必要环节，而且紧密链接着我国学界外国文学研究的方方面面，甚至还会由总体外国文学扩而大之，涉及国际“世界文学”和“比较文学”学科所探讨的诸多重大学术前沿问题，其中包括总体外国文学史、比较文学史，等等。

在《构建多维视野下的新世纪外国文学史》一文中，我欣然写道：“据我所知，在弘扬马克思主义科学发展观的照耀下，各层次各类型研究外国文学史的专家学者，以及这些方面的编撰人，正在为构建具有独立中国特色的外国文学史奋斗不息。①接下来，以“马工程”外国文学史课题组为代表，彰显其积极开展各项工作“势头很好”，并引用了聂珍钊教授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外国文学史》教学大纲讨论会上发言中所强调的“三反映原则”：务必“充分反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充分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经验，充分反映本学科领域的最新成果”②。理所当然，各届广大读者和有关文教工作者（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都殷切期待这样一部异于过去各类模式的真正高水平的外国文学史教材。在“外国文学课程国际化”全国学术研讨会（2011 年 4 月 23

日)上,我在发言中回溯了近百年来中国的外国文学史,编撰与研究的历程,强调遵循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重构中国特色外国文学史的必要性和重要战略意义。在这里,同样凸显了坚持科学发展观的跨越会通式创新精神。

世界文学发展史已翔实表明文学即审美的“人学”,其本质(性能与性理)是人类对生活历程和时代变迁的审美反映,同时也是认知自我发展的艺术化观照。无论外国文学史抑或中国文学史的编撰,均不能离弃“人学”灵魂与审美原理。在世界走向中国、中国走向世界的当下,在“十二五”开局之初文化教育发展趋势喜人之际,作为教育部特大攻关项目之一、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第一批重点教材“外国文学史”的编写是适时的,这一历史的、审美的“人学”工程无疑以反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为“重中之重”。由是观之,构建如此“外国文学史”具有加速繁荣社会主义文化教育的深远战略意义,责任重大而使命光荣。

作为高校教材的外国文学史的编写,当然应该吸收国内外同类教材编写的成功经验,基于此而勇于探索和攀登学术高峰,通过“继承-发展-超越-创新”的金光大道,献出外国文学编纂史上又一部具有广泛代表性的优秀成果。基于此而坚持“四性会通”:世界性、本土性、当代性、比较性,以及力求“四方合一”:丰富、客观、系统、适用,并且贯彻始终。就世界文学、比较文学(合二为一或一分为二)学科发展“边缘”的需求而言,这是一部跨国度、跨时代、跨文化、跨语言的外国文学史,凸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的外国文学史与国际文坛上多种世界文学携手同行,互动融合;在比较视野下交流,从讲述并研讨外国文学(世界文学)历史发展全程(古代-近代-现当代)中走向“以人为本”乃至彰显审美人文主义的光辉境界。

无可争辩,外国文学不包括本国文学,系指中国之外的世界各国文学,但它又必须与中国文学在文化精神上彼此感应。从东方到西方,从当代到古代,由亚洲、非洲、欧洲、美洲和大洋洲各国的文学所组成的世界文学,多方面地反映了人类社会的嬗变过程与人类审美思维发展的轨迹。就我国编写的域外文学史而论,在欧美文学史和亚非文学史上,或在东西合一体系的外国文学史上,均可见出五光十色的文艺思潮和各具特色的表现方法,拥有像荷马、迦梨陀婆、但丁、莎士比亚、莫里哀、歌德、拜伦、巴尔扎克、托尔斯泰、易卜生、夏目漱石、泰戈尔、高尔基、德莱赛、艾略特、海明威、川端康成、马哈福兹、萨特、艾特玛托夫、马尔克斯、博尔赫斯等许多影响深远的伟大作家。他们运用妙笔,通过各种形式描绘他们的时代,鸣奏他们喜怒哀乐的心曲,从而表达了人民大众的情感,提高了艺术的表现力量,丰富了世界文学的宝库。简约言之,外国文学史即外国文学的历史,虽然不等同整体外国文学,但以“史”并结合“论”的形式保存并凸显各时代文学精华。

可以这么悟解,一部外国文学史,就是外国文学创作与外国文学批评在相互依存、相互促进中发展的历史。为此,我们学习、研究外国文学,就不可不关注文学的理论、批评和方法,他们的论著既总结了各个不同时期的文学创作经验和规律,又对不同时期的文学创作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值得特别强调的是 20

世纪的西方文学批评，对东方文学批评和文学创作有显著的影响。在西方，如果说 19 世纪以创作为中心，那么，20 世纪则是批评的时代，文学批评已经成为独立的学科。面对万花筒似的西方文评的各种流派，我们固然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却又不能不向他们开放，不能不借助它们促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方法论的总体性发展。一般来说，现代西方文学批评有三方面的突出特征：一是注重形式，二是偏向心理，三是与其他学科渗透。从形式主义、新批评、精神分析、神话原型批评到结构主义以及与结构主义关系密切的接受美学等流派，都从各自的角度侧重某一点或同时融合三种特性。这些流派的理论不可避免地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缺陷，但它们确实各有其可取之处，能作为我们文论与方法论的有益的对比参照系，学习外国文学、外国文学史务须关注上述各方面的原则，编撰或讲授外国文学史教材更应如此，乃至要求切实把握并予以创造性运用。

二

在外国文学发展的历史长河里，形象地再现了人类从古到今所经历的各个阶段的经济、政治、文化生活、时代精神和社会阶级冲突。由此可见，包括欧美文学和亚非文学在内的外国文学所提供的资料 and 知识、思路 and 理论，对于我们认识与研究外国的历史与现状以及丰富、武装我们的头脑大有裨益。一切优秀的外国文学，都能给人们以良好的教育与有益的影响。它所蕴藏的人民的战斗精神和生活智慧，对读者有毋庸置疑的思想启迪作用。过去的文学作品，特别是资产阶级文学作品，确有时代的、阶段的局限，但是它们还有憎恶、揭发社会黑暗、向往、讴歌美好理想，总结历史经验与教训的一面，这些作品对广大读者仍有教育意义。无论西方还是东方，从近代文学到现当代文学，均有极富于教育意义的大量名作，不仅古典作家作品，而且现当代作家作品，均属此类。就其积极的方面来说，都能引起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人们的深思，启发人们除恶向善，鞭笞黑暗，迎接光明。

从文学史上看，在地区与地区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今与古之间，创作启示与艺术借鉴是必要的，而且是世界文学发展的必然趋势。世界各国的卓越的作家，在本国文学发展的土壤上，常常学习别国文学的长处，创作出具有自己民族风格和艺术特点的作品。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学固然要继承自己的文学传统，但在其发展与革新中，都离不开其他民族文学的滋养。法国作家伏尔泰从马若瑟译出的中国元杂剧《赵氏孤儿》（纪君祥）中受到启发，改编成五幕剧《中国孤儿》。尽管《中国孤儿》与《赵氏孤儿》比较，改动相当大，但对《赵氏孤儿》借鉴之处仍很多。在俄国诗人普希金的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中，显然有拜伦诗作的影响，启示与借鉴兼而有之。可贵的是诗人汲取了拜伦诗作的养分，抛弃了拜伦诗作的弱点，而且创作了“俄罗斯生活的百科全书”，近代、现代亚非优秀作家，往往以民族文学传统为基础，接受近代欧洲文艺思想影响，借鉴近代欧洲文学表现手法，以建立自己的新文学。

各国文学相互影响，彼此借鉴，乃是客观存在。马克思、恩格斯都很重视艺术借鉴作用，他们在《致拉萨尔》的信中，要求《弗兰茨·冯·济金根》的作者借鉴莎士比亚戏剧艺术，做到“莎士比亚化”。恩格斯

在《致玛·哈克奈斯》的信中，劝导《城市姑娘》的作者学习巴尔扎克的艺术方法，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有这个借鉴和没有这个借鉴是很不相同的。外国文学蕴含着丰富的经验，拥有多种多样的表现手法，学习和借鉴这些经验、手法，可以促进我国文学艺术的发展。从“五四”时期的鲁迅、郭沫若、茅盾等文学巨匠，到当代的一些有才华的作家，大家从外国文学作品中得到过启示和借鉴。如此看来，外国文学的启示与借鉴是不可少的，而怎样感受外国文学的启示，怎样有效地借鉴外国文学也许更加重要。

此外，学习外国文学，不仅有助于我们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政治哲学论著、文艺论著以及其他有关学科专业，还可丰富我们的知识，武装我们的头脑，促使我们掌握更多的从事社会主义文化教育工作的实际本领。学习外国文学也是中外文化交流与国际往来的需要，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大有裨益。

话说到此，适当浅释世界文学与世界文化的密切关系，从而展开中外文学文化交流的探讨，顺理成章，并非多余之言。歌德所说的“世界文学”，与世界文化的渊源和突变息息相关。文学与审美文化（如绘画、雕塑、建筑、音乐等）、非审美文化（如哲学、史学、政治学、经济学等）都是沟通的。《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世界的文学”，原意系泛指科学、艺术、哲学、历史等文化方面的，当然也适用于狭义的艺术文学。歌德的发现，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论断，完全符合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进程，同时也可从中体会作为子系统的文学与作为母系统的文化之间的密切关系。在这里，我们先对这种关系略予解释，用以作为进一步探究“世界文学的时代”或“世界的文学”的“即将来临”的基础。翻开东西方文化史，无论从纵向或横向考察，均不难发现文化与文学的密切关系。在中国文化史中，先秦是第一个重要的文化转型时期，魏晋南北朝是第二个重要的文化转型时期，都曾出现过多元文化发展的局面。先秦文化上的“百家争鸣”，引发了散文、辞赋文苑中的“百花齐放”；魏晋南北朝时期在正统儒学衰落之际，印度佛教传入而玄学兴起志怪小说就宣扬了佛教的哲理；到了唐代，儒学又受到推崇，韩愈、柳宗元等作家的作品就表达了尊重儒家哲学、反对佛教与玄学的思想倾向。20世纪是中国文化史上的第三个文化转型时期，又一次多元发展、繁荣、丰富多彩，而作为文化之重要表现形式的文学创作，必然会观照文化发展之态势。

我国人民创造的辉煌灿烂的文化，对于亚洲文化、欧洲文化的影响相当深远。同时，我国人民在创造民族文化的过程中，一向善于吸收外来文化。汉唐以来，我国和亚洲、非洲、欧洲许多国家和地区就有文化往来。汉武帝统治时期（前140—前86年），开辟了一条通往西域的漫长的“丝绸之路”，我国和印度、波斯、叙利亚以及近东各地区发生了往来，甚至和地中海地区、欧洲大陆也有了文化接触。唐、宋、元诸代，特别是明朝中叶以后，中外文化交往扩大了范围，接触较前更为频繁。就文学领域来说，中国文学在国外外国文学在中国，互有影响，双向交流。唐代诗人李白、杜甫、王维和日本学者晁衡交往甚密。晁衡曾在中国供职做官，经常做诗撰文。他回国时，在海上遭遇大风，漂流至海南。误传噩耗，李白写诗悼念：“日本晁衡辞帝都，征帆一片远蓬壶。明月不归沉碧海，白云愁色满苍梧。”（《哭晁卿衡》）白居易的作品，很受当时统一朝鲜的新罗人的欢迎。唐代末年，新罗留学生崔致远在中国任江苏溧水县尉，他的作品《桂

林笔耕集》（汉文古诗与散文）20卷为唐代文坛增添了光彩，曾收入中国的《四库全书》。他在留唐时期的代表作《江南女》、《双女坟》颇有汉诗风韵，是朝鲜汉诗发展史上的杰作和中朝古典文学融会的“晶体”。我国从晚清开始大量介绍海外文艺思潮、文学流派和各国文学史，比如：吴汝纶为严复译赫胥黎的《天演论》作“序”，此文作于1898年4月；梁启超的《卢梭学案》发表于1902年9月的《新民丛报》；陈独秀的《现代欧洲文艺史谭》发表于1915年11.12月的《青年杂志》第1卷3.4号；雁冰的《近代文学的反流——爱尔兰的新人文学》发表于1920年的《东方杂志》第17卷第6.7号。此后，中外文学交流进一步向纵深扩展，取得了更大的成绩，更加引人注目。

20世纪东西方文学，中外文学交流，具有新的时代精神，20世纪东方各国文学的多元化，表现对欧美文学的借鉴。在现阶段，亚非民族革命文学与社会主义文学在继承自己文化传统的基础上，接受了西方文学和俄苏文学的影响。与此同时，日本、印度、印度尼西亚等国以及阿拉伯地区也产生了一些蜚声欧美的派别与作家。

翻开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欧美文学的影响十分明显。这里所讲的欧美文学，当然包括古今作家的作品，既有近代的文学传统，又有20世纪新兴的各种文学流派。五四运动期间，直到20世纪30年代、40年代，西方文学从四面八方涌进中国，对中国新文学造成一种“全面拿来”的局面。如果说五四时期及其后的文学价值取向，是以18.19世纪的浪漫主义、现实主义为主，从五四时期一直到20世纪60年代，俄苏文学的影响经久不衰，那么，在此后近几十年里，新的文学的价值取向则是多元化，即以20世纪西方文学为主借鉴对象。在这方面，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后现代主义文学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中的影响显得既复杂又突出。中国现当代文学进入了世界文学的范围，不仅拥有日本、朝鲜、越南等东方国家的读者，而且在西方文坛上也有一定的影响。西方一些国家和前苏联、东欧国家不仅译介了胡适、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沈从文、丁玲、周立波等现代作家的作品，而且还译介了当代的特别是新时期的作家作品。不过，中国现当代文学在国际文坛上的影响还不够深广，20世纪中西文学交流呈现不平衡状态，这是客观存在。我们必须继续努力，做好文学“输入”、“输出”译介工作，做好双向文学交流工作。中国现当代文学在世界文学中的格局，它的世界文学化与民族特征的现代化，已成为作家、评论家、翻译家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研究课题。人们已经开始关注：文学创作不仅重视它的世界性，汲取精华会通而来的共同性，还应该实现它的民族性，发扬优秀传统而来的特异性。

三

1995年4月，乐黛云教授在全国高校外国文学教学研究会举行的“北京年会”的专题报告中满怀信心地说：“不久的将来，一定会出现以中国文化为诠释框架的中国人写的外国文学史，当然，也会出现以外国人自己写的外国文学史。”他还提及杨周翰教授生前的殷切期望，“我们需要中国人自己写的外国文学史”^③质而言之，新来的21世纪文化景象已凸显强劲的“亲和力”，多元共生而其存，互动而互补；人类众多共同关注的问题（如自然环保生态等），均需运用不同文学的多维视角进行多层面的探索、

研究并予以逐步解决。不言而喻，处于文化前沿阵地的文学，自然承担着具备特异功能的任务。就外国文学教学和研究来说，编写各类型中国特色的外国文学史（过去我国高校中文系科“约定俗成”称之为名不副实的“世界文学史”），确实是时代前进的需求，无可延缓的文化教育重大工程。

依据有关“文献”，建国60年（1949~2009）的外国文学史的编写大致分为“和其正并兼及反”的五个阶段。第一阶段（1949~1965），从新中国建立伊始到“文革”，或可称作“新兴向荣时期”；第二阶段（1966~1976），“文革”十年，或可称作“延续徘徊时期”；第三（1977~1985），从中国外国文学学会成立（1978）前夕到“外国文学研究工作八年规划（1978~1985）全部完成”之日，或可称作“新发展时期”；第四阶段（1986~1999），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继续深入“拨乱反正，解放思想”到两个世纪之交，共和国60年华诞和中国外国文学学会第六届年会在上海召开（1999），或可称作理论与译介、历史与现状向深广度“加速前进时期”；第五阶段（2000~2009），从中国外国文学学会“上海年会”之后到第十届“杭州年会”（2009）之后，或可称作积极探索建设中国特色外国文学学科的“新起点时期”。其实，就中国学界曾经流行的中外学者在西方文学史观指导下编写的外国文学史（以译介或译述为主）而言，早已有之。建国前的20年代前后，以及30、40年代，一直到建国之初，对我国高校影响比较深广的有“欧洲文学史”。首先提到的是清华大学外语系教授詹姆森（R.D.Jamson）的《欧洲文学史》（英文版，由商务印书馆1930年出版），这其实是詹姆森在清华大学讲授西方文学史的讲义汇编，后来成为一种通行的教材，在建国前对各个高校影响很大，这本书重点在于文学史的简述，一般不设作家专章专节讲述。我国周作人的《欧洲文学史》在当时的影响也是比较大的，比詹姆森的还要早，大概在20世纪20年代之前就已出版。这本文学史也是重文学史知识，不重作家作品分析。此外，高天行编著的讲义《西洋文学史》（北平中国大学，1935）在当时学界的积极作用，不容忽视。建国前，可提及的国别文学史，以英法为主，重要的有穆木天编著的《法国文学史》（上海世界书局，1935），夏炎德编著的《法国文学史（商务印书馆），1937》、吴达元编著的《法国文学史》（以法国文学史家朗松的同名著作为蓝本，1940）以及金东雷著《英国文学史纲》（商务印书馆，1937）等。

建国后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前期，东欧非常流行弗里契的《欧洲文学发展史》，译文本出版于1954年，由新文艺出版社发行，这本书大概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西方有广泛影响，50年代在我国也有很深刻的影响，此书在1908年问世，1920年修订，作为苏联的党的高校文学部学生的参考材料出版。其优点是比较早的试用马克思主义文论系统来分析欧洲文学，因此，在上个世纪50年代对我国的影响比较大，在我国文学评论界和高校教学中，调适单纯西方文评观念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他以经济决定理论对文学进行单纯的阶级分析，存在庸俗社会学倾向。最大的毛病是割裂了文学自律与他律的关系，1、用政治理论来代替实际；2、言说方式严重欧化、失语，搬用西方名词；3、庸俗社会学流弊还未彻底清除；4、缺乏中国特色的独立体系。因此，重构中国特色外国文学史非常必要。

值得特别关注：从斯达尔夫人到勃兰兑斯，从季莫菲耶夫到斯蒂芬诺林的文学史观，他们的基本特

点就是以史为经，以作家作品为纬的文学史结构。对此还应以中国文学批评史为“参照系”，这是建立自己独立体系的需求。总的来说，我们还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方法，摒除庸俗社会学的影响，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要坚持做到“四性结合”与“五环互动”。正确理解和实践“四性结合”很重要，如没有四性结合，也谈不上五连环协作。

在当今学界研讨文化（文学）全球化与本土化“二元并存”、“双向交流”、“多元混合”的背景下，在坚持本土化身份和弘扬民族文学优良传统的原则上，强调外国文学作品重读重评，鼓励外国文学史重构重编，如我们所知，这是“与时俱进”的需要。然则，构建中国化（形成自己独立体系）的外国文学史如何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切实突出中国文化精神特色而且模式创新，显然是重大的关键所在。一部外国文学史从策划到编撰的全过程必须始终贯彻“四性结合”，即世界性、本土性、比较性、当代性的融通调适，书稿是否达到这样的准则，有关既定专家评审当然重要，同行学人（包括不同意见者）参加议论也不可少，并行不悖，应向诸葛亮学习——“集思广益”。

将世界文学的远景当代化，大肆宣扬其“全球化与多元化”相见欢的文化属性，这是当下带有国际性的热门话题。在这里，切勿忽视如此意见：全球化与多元化之说貌似平等，其实不然，甚至“也是一个悖论”。切勿任意机械搬运使用，谨防走“西方化”或“美国化”的旧路，政治经济方面如此，文学文化方面亦如此。辨识诸如此类问题之后，讲述“五环互动”的设想就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了。所谓五环互动的“五连环”即指以下五个方面：

1、运用文学史论讲述历史条件、自然和社会环境、文学土壤和时代人文精神。采用以“面”带“点”，点面结合的模式，坚持历史的讲述和文学审美的批评方法论，这完全符合文学从来就是人类对生活与时代审美反映的史实。2、作家作品评鉴力求清晰，名家名著突现其应有的地位，却又不抛弃一般的作家作品。诚然，文学史绝非名家名著评论集，却又必须防止“去经典”、“去中心思潮”理论的误导。3、文学思潮发展过程要系统化，努力表现和阐释其中含混的多元化的文学矛盾。在文学史上，有些小流派影响深远，也应予以适当关注。4、我认为文学是广大读者、文学史家、文学批评家对话的场所，交汇感悟的地方，一部外国文学史旨在让人们交流、接受文学意识。5、重构中国特色的外国文学史，务必以中国古今文学发展史为参照系，平等比较与影响比较并举，这样才便于促进东西、中外文化文学交流。现在，从总体上解说“五环互动”协作关系。组编任何类型的外国文学史，均应始终坚持“五环互动”的原则。“五环”之中以第五环为主干，在第五环的统领下环环相扣，突出中国特色必然包括自己体系的形成；各环互动不仅表现为语言文字方面的呼应，而且体现在“史”的叙述和“论”的阐释等内容结构之中。这样构建中国式的外国文学史，只是表层设想，真正把文学史做到深层次，还需要进一步的论证和精细的思考。比如，中国特色外国文学如何凸显“人学”发展过程，就应认真探索。

可以认同童庆炳先生的高见，不能再走“全盘西化”和“固守传统”的旧路了。既要远离民族虚无主义支持的“西化”，也不迷恋极端民族主义的“化西”，学术总是可以通过不同方式的“平等对话”，

互相借鉴，彼此沟通，求同存异，并肩前进。④钱钟书先生在1984年中华书局出版的《谈艺录》“序言”中早已指出，文学性（以及文论性）的演变，主要标志着人类文学（及文论）的走向，即学界所传诵的名言：“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海、北海，道术未裂”。为此，通过古今，中外、东西对话，反复研究文学性和文学理论的历时深化和共时并存的复杂态势，很有必要。不必讳言，基于“对话”的“整合”务必伴随“争鸣”进行长期调整和“适应”。像学贯中西的大师冯至、朱光潜、宗白华、钱钟书、季羡林等在这方面取得丰硕的成果，值得当今学人认真学习。

总之，构建当代中国特色的外国文学史，无疑是一项特殊重大而反复精益求精的审美“人学”工程，任重道远，各方面的矛盾冲突和艰难险阻不会少。然而，这项工程和建立“以人为本”，“以我为主”的“中国外国文学学”有密切链接关系，前者（编写自成体系的外国文学史）是后者的必由之路。为此，我们必须坚定信心，克服一切困难，跨越一切险阻，奔向光辉的前程。今日世界文坛需要真、善、美会通一体的中国特色外国文学史。它将通过世界文学的比较性、比较文学的世界性的讲述，充分表达“中国心”、“文学情”和“世界爱”。现在，马工程《外国文学史》以东西方文学融为一体、“点”与“面”互动结合的模式呈现在广大读者面前了，中国文学当然“缺席”，而作为“对话者”的特色，各章仍不难岁出。尽管书中难免不足之处或刍蕘之议，但它为日后编撰更高水平之中国特色外国文学史教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注解 [Notes]

- 1 王忠祥：《构建多维视野下的新世纪外国文学史——关于编写中国特色外国文学史的几点理论思考》，《外国文学研究》5（2010年）：120。
- 2 参见报道“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外国文学史》教材大纲讨论会召开”，《外国文学研究》1（2010年）。
- 3 参见乐黛云《积极推进文学研究中的新思想和新观念》，李明滨等主编：《文学史重构与名著重读》，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1~3。
- 4 参见童庆炳著《中国古代文论的现实意义》，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338~339。

引用作品 [Works Cited]

R.D.Jameson. *A.Short History of European Literature*, The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Shanghai China,1930.

[R.D.Jameson: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Western Literature and Language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Peiping; Lecturer, Peking National University.]

.